

◀ (上接8版)

父母,通知《上海市区方言志》获奖。后又复印该奖状,一份送我父母,一份寄美国,却忘了告诉我《今日汉语》得奖之事。

长话短说,我腾出主要精力编方言志,语料收了很多,到了筛选入稿阶段。这时,教研室来要人,叫我去开课。不知是教研室主任还是哪位老师,当众这么说:“该让亚明全面发展,否则将来职称高了,上讲台还‘怯生生的’,学生不会原谅的。”

汤老师是“带”我的,与我各教一个班。她挑人多的,大概是文学班,让我教人少的专业班。课程名“现代汉语”,对汉语专业是基础训练课,其他专业则为普及教育课(依我理解)。教学目标不同,但采用同一套传统教材,胡裕树主编的《现代汉语》。

下面说说“这教材”。

我径直跑去找胡先生,直截了当地问:我可不可以自编新讲义,不用你的老教材?

胡先生应声答道:“当然可以!”(非常干脆,值得加感叹号。)胡先生说,要是他自己开课,也不会再用他那套老教材。要不是“文革”,“早该编新的了”。胡先生接着说,他上年纪了,国际语言学出了不少新理论,来不及一个个看,“以后用你编的”。

我连忙解释,我准备编的讲义,不适合作为统一教材。我是想邀请学生与我一起探讨,取一个理论框架,依其原则推到极点(年轻不知天高地厚,敢用“极点”二字)。看看到底什么语言现象能被解释,什么不能。所以,这次开课我编讲义检验某一理论,下次开课我可能另编新讲义,检验另一个理论。

那阵子我正在憧憬语言学的前景,有些刚萌芽的想法。但除了与哲学系友人,从来没跟本专业的师友往深处谈。不知怎么一时兴奋,在胡先生面前大言不惭地说了起来。说着说着,又聊教学理想,诸如以训练思维能力为主,传授现成知识

为次,重在激发求知欲和增强自学本领……我并没预习“演讲”,事后回顾,很不得体,而且语无伦次。

胡先生听得饶有兴致,见我暂停,他示意在等下文。见我卡住,他以表情或话语助我疏通。总的感觉,胡先生能“读”我。临别,胡先生鼓励我不断探索,随时找他畅所欲言。

这是我与胡先生最长的一次谈话,不超过一小时,也许仅仅半小时。

再说汤老师与我各教一班,上课时间并行。有一天,我下课走出教室,见汤老师在门边候着。她说是特意提早放课来找我的,脸色蛮严肃。原来,我班学生告诉她班学生,我自教一套。“你跟胡先生打过招呼吗?”汤老师急急地问。我扼要简介了我与胡先生的谈话,汤老师连声说:“那就好,那就好。”

出国留学

倘若没有胡先生重提出国留学这个话题,也许我至今还在复旦。

话得往回说,说说我班的班主任兼指导员范晓老师。

我们由学校安排就业,临近毕业,范老师逐个找学生一对一谈话。轮到与我聊去向,范老师没有讲半句大道理,只是说:“你太单薄,到外面去会吃亏。留在复旦,系里老师都了解你。”

我感触很深,记得很牢。

没想到隔了些时,范老师又来约谈。他告诉我:上头说,要你保证不出国,才能留校。

我不认为那是对的,一声不吭。

从范老师的语调神色可知,那不是他的意思,但不得不传达。他两难,我也两难,都不愿为难对方。

范老师仗义,为我作了担保。尽管范老师对我说,“啊呀不过一句话”(言外之意……),



7811 毕业合影,前排左起第十一位是朱东润先生,第十五位是胡裕树先生。

但我能对范老师不义气吗?

三年过去。

一次,系里若干教师一起外出。好像是搭公车,车上乘客不算少,但也不算拥挤。我们各自找空处,三三两两自然成群。如果低语聊天,一般只有近旁几位可以听见。(这段记忆模糊,以下相当清晰。)

胡先生和我,还有另一位老师,碰巧比较近。胡先生突然问:“亚明,你还想出国吗?”

我愣住了。

虽然我相信,那个“保证不出国”的要求绝对不会来自教过我的老师,但我留校时胡先生正担任系主任。他对那事看法如何?我很想知道,但没有吭声。

静场约摸一分钟,当时感觉很长。我快憋不住了,差点儿想开口问,却又迟疑。

看来,胡先生确实能“读”我。他直言对答我堵在喉咙口的疑问,说:“那是不对的!”(不加感叹号,不足以体现胡先生语气之斩钉截铁。)

无论学生期间还是留校之后,除了学术,我从来没跟任何老师评议“对”与“不对”。

我与胡先生目光交接,都懂,所见略同。旁边那位老师(徐志民老师?)似乎明白胡先生说什么,一言不发地用眼神“赞同”(在我看来)。

胡先生追加简短数语,大意是如果是我,会再次申请出国读研究生(毕业前我曾申请,教务处不发成绩单)。之后我还犹豫了几天甚至几周,才去请教另几位老师,也该包括范老师。凡被问到的,都主张立马行动。猜想上头政策也有松动,这次我顺利取得了成绩单。

报名起步虽慢,录取通知倒来得快,整个过程不长。其间我找过几次胡先生,有关推荐信什么的。好像胡先生还替曾

在美国的郑锦权教授,向我转达过一次口信。那时胡先生已不当系主任了,记得是去他家,他小女儿开的门。先前在南下途中,胡先生曾预测,我该会跟他小女儿谈得来。可惜每次登门都很匆促,没跟他女儿多谈。

再“饶”一事,涉及系主任和推荐信。踏进复旦的那一年,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朱东润先生;挥别复旦的那一年,朱先生为我写了推荐信。

我们这拨本科生,无缘听朱先生讲课。应有机会听朱先生在大会上讲话,按理系主任该在迎新会上致辞?只叹出席盛会的机会,常常被我错过。直到毕业三年后,系里有位教过我的老师(也许是周斌武先生?),带我去请朱先生写推荐信,才得以拜见,可惜想不起细节。估计引荐者(或者是孙锡信先生?)早已讲清原委,只是要我本人到到场,让朱先生见见。

我想,朱先生为我写推荐并不违反什么原则,他一定信得过那位老师(真不好意思我记不清是哪位)。而朱先生作为我进校时的第一位系主任,概述系里老师评语,顺理。后来我去的学院,并不是请朱先生推荐的那所,但仍该感激他,还有那位好心的老师。

* * *

回到胡裕树先生,细想交往,事事值得回味。我在胡先生麾下直接工作时间最长的,无疑是编写“那教材”《今日汉语》。但如果从作为师生的角度,选择一件受益深远的,大概得数围绕“这教材”即现代汉语讲义的一席谈。我认为,胡先生支持青年教师不用系里传统

使用的、他本人主编的现成教材,而鼓励后辈学生(我的心态始终是学生)自行摸索,意义深远……此刻联想多途,思路尚未理清,希望胡先生在天之灵继续“读”我。

回顾在复旦当大学生和“太学生”的八年,虽然关于治学与教学方法论,在本系谈得最深的一次是与胡先生,但系里不少老师都在学术方面,给了我相当的自由度。这里先简括总体印象,以后再忆实例。

恰巧又读到胡中行兄回忆章培恒先生的新作。我在复旦中文系的最后阶段,章先生是系主任。因他正在任上,专业又不同,我与他几乎无接触。读胡兄“逃离”一节,想起自身一事。为了我的归属,汉语教研室和方言研究所也曾争执,据说相当激烈。最终我到了教研室,而主管方言研究的许宝华先生照样待我友善,犹如“自己人”。(综合石汝杰、贺国伟等多位反馈,研究所的正式名称是“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”,与中文系平级或曰平行,互不隶属,但有兼职。范晓老师说,他的编制就是属于所里的,但也在中文系从事教学工作。顺便解释:承蒙多位当事人预览,得以插入些许补充更正。我试用括号注,区分直接和间接知识。)

我始终不太清楚,哪些老师属于“系”,哪些属于“所”。篇首言“系里所有教过我的老师”,也包括“所”。可以说,都对我很友好,无一例外。过去我一直以为,老师爱护学生是理所当然的。转眼毕业三十六年,离开复旦也已三十二年,竟然从来也没有向老师们表示过感谢。短短拙文虽晚,惟愿略道难以尽言的歉意与谢意。



与胡裕树先生合影,1983年9月。